

# 共和道路

# 在近代中国

● 胡维革 于秀芹 主编

94.11.21



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

---

# 共和道路在近代中国

---

胡维革 于秀芹 主编

---

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

---



谨以此书

纪念辛亥革命 80 周年

# 目 录

---

中国近现代史上的资产阶级共和国方案及其破产（代序） ..... (1)

I 初醒者的追求与探索 ..... (18)

I-1 共和道路的滥觞 ..... (19)

I-2 狼毫笔下的共和国思想 ..... (37)

I-3 人间天国的尝试 ..... (49)

I-4 富强大厦的坍塌 ..... (62)

I-5 君主立宪的幻灭 ..... (71)

II 色彩斑斓的共和国方案 ..... (81)

II-1 “三民主义”的天才构想 ..... (81)

I-2	“中华共和国”的绚丽 蓝图.....	(102)
I-3	“一日千丈”的革命思 潮.....	(109)
I-4	抛头洒血为共和 .....	(127)
III	昙花一现的南京临时政府 .....	(139)
III-1	“大乱者，救中国之妙 药” .....	(139)
III-2	共和国雏形 .....	(153)
III-3	“革命时代之政府” .....	(166)
III-4	拥袁、倒清、共和三重 奏.....	(183)
III-5	写在纸上的共和国 .....	(201)
IV	“民主共和制”的破产 .....	(217)
IV-1	议会道路的悲歌惨剧 .....	(217)
IV-2	“洪宪帝制”的猖獗表 演.....	(234)
IV-3	步履维艰的护法运动 .....	(252)
IV-4	军阀政治形形色色 .....	(266)
V	走不通的“第三条道路” .....	(278)
V-1	“第三条道路”的开端 ...	(278)

V-2 “第三党”的“抗争” … (294)

V-3 短命的“第三种政权” … (309)

V-4 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最后  
一幕…………… (321)

跋…………… (338)

# 中国近现代史上的资产阶级共和国方案及其破产（代序）

杨裕南

明代中叶，中国已产生资本主义萌芽，但是，近代中国却没有在资本主义萌芽进一步发展的基础上，进入资本主义社会，反而，由于帝国主义的入侵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从近代起，一批又一批先知先觉的中国人艰难地在黑暗中摸索，试图寻找一条独立地发展资本主义的道路。这样的探索最终都没能成功，各种资产阶级共和国方案一一破产，中国最终由半殖民地半封建走上了社会主义的道路，成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回顾这一历程，对于我们今天更好地认识国情，不无裨益。

## 一 移花接木的尝试

鸦片战争的爆发，标志着中国的一个

新时代的开始。战争结束后，英国政府以炮舰为后盾强迫清政府签订了中英《南京条约》及其附约。条约中关于赔款、割地、通商、协定关税及领事裁判权的规定，严重地侵害了中国清朝政府封建国家的主权。接着，美、法等资本主义国家也纷纷将侵略的魔掌伸向中国。这些资本主义国家仰仗与中国签订的各种不平等条约的保护，一方面廉价搜刮中国的农产品，另一方面竭力想把中国变为其广阔的工业品市场。疯狂的经济侵略和变本加厉的鸦片贸易很快就使中国由鸦片战争前的外贸入超变为外贸出超。资本主义的入侵并没有直接给中国带来资本主义发展的新希望，却给中国套上了半殖民地的束缚。战后，中国的社会经济一时停滞不前，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十分尖锐。在这样的历史前景下，中国出现了一批探索国家和民族出路的改革家、思想家。

早在鸦片战争前夕，龚自珍即揭露和批判清朝社会的种种矛盾和弊端，指出封建统治行将结束的历史趋势。由于其时代和阶级的局限，龚自珍看不到资本主义的曙光，因而还只能从古代的封建社会中寻求解救封建统治危机的良方（“药方只贩古时丹”）。尽管如此，在中国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大转折时期，龚自珍深刻的社会批判思想，对打破万马齐喑般的清末社会有晴天霹雳般的作用。近代中国的资产阶级改革家、思想家无一不从其思想中获取教益。林则徐在禁烟抗英的斗争实践中认识到，为了战胜英侵略者的坚船利炮，必须学习西方的军事技术和装备。作为一个头脑清醒的爱国者，他首倡了解西方、学习西方。为此，他曾主持编译了记述世界各国历史、地理、政治及风土人情的《四洲志》。魏源在《四洲志》的基础上编纂了《海国图志》，提出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这一主张

成为日后中国学习西方的先声。魏源在指出学习西方战舰、火器及“养兵练兵之法”等长技的同时，还积极主张学习西方先进的生产技术，发展中国的近代民族工业。更重要的是，他在进行上述论述时，触及到了西方资本主义的政治问题。他以赞赏的口吻详细介绍了英国议会制度和美国的民主制度。显然，朦朦胧胧的资产阶级共和国方案实际上至此已被不自觉地提了出来。后来的资产阶级思想家、改革家和革命家正是由此出发，进一步更详细描绘资产阶级共和国方案。因而，魏源及其同时代的思想家在这一方面的探索及成果具有不可抹煞的作用。

当地主阶级改革家、思想家在摸索救国方案时，作为封建统治者对立面的农民领袖也以其独特的方式积极探索救国方案。十分有趣的是，他们不约而同地先后提出了资本主义的发展方案。这种现象出现的重要原因是，在19世纪世界资本主义时代，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两种社会制度的孰优孰劣已表现得十分明显，发展资本主义成为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在时代大趋势中，由于私有制所决定和制约的阶级局限，每一个耳濡目染资本主义先进文明的思想家都只能认识到资本主义这一发展前景。

1859年，太平天国干王洪仁玕在天京撰成《资政新篇》。《资政新编》的主要思想是学习西方，发展资本主义。洪仁玕在文章中提出了许多发展资本主义的具体经济措施，如兴办近代交通运输业，开矿、设厂、开办银行及邮政，鼓励发明创造，实行专利制度，等等。他还提出设新闻馆、立法制度，并以一定篇幅介绍美国的民主选举制度。洪仁玕还试图依靠农民革命政权的力量，自上而下地推行这一资本主义方案。由于太平天国远未取得全国的政权，再加上农民阶级作为小生

产者自身的局限，因而，这一远未完善的资本主义发展蓝图也只能是一幅幻景。

洋务运动是“师夷长技以制夷”主张的实践。19世纪60年代初，清政府的官员曾国藩、李鸿章等人在镇压太平天国起义的过程中，深感购、制洋枪洋炮的重要性和迫切性。1861年，李鸿章设立安庆军械所。这场标榜“自强求富”的学习西方运动以此为开端。它严格恪守“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指导思想，引进西方的科学技术用于军火、轮船、矿山的生产和开采。资本主义近代机器被移植到中国，但是，洋务官僚基本上是按封建主义的方式来管理资本主义机器生产的。官办的军事企业几乎没有商品生产的特点。它们的开办经费主要从军费中划拨，生产的目的是为了制造武器，以便加强军事力量，维护封建统治。洋务企业的创办者并不想把企业的产品转化为商品，生产的成本也未核算。由于管理十分落后，这些军事企业大都入不敷出，因而也没有由企业利润转化而来的资金积累，更谈不上资本主义式的扩大再生产。除了个别企业外，大多数企业都愈益难以长久维持生产。随着洋务运动的发展，出现了官督商办的民用企业。民用企业的投资，一部分来自官方，大部分招募私人股金。它们生产的目的是为了赢利，因而比军事企业具有更多的资本主义性质。民用企业虽大多名为“官督商办”，但入股的商人在企业管理上没有发言权，清朝的洋务官员对这类企业的管理方式与对军事企业的管理基本一样，具有很浓的封建性。此外，无论是洋务派的军事企业还是民用企业，还都具有相当的买办性。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近代企业起步很晚，基础薄弱，企业所用的机器、原材料、技术，甚至管理人员，在很大程度上都要仰赖外国资本主义；同时，由于外国在华设

立的同类企业有不平等条约的保护，使得中国的近代企业在清政府封建势力及外国资本主义的排挤中极难发展、生存，它们甚至在与外国资本主义势力在同等条件下竞争的机会都没有。因此，到后来，许多洋务企业要么倒闭，要么为外国资本主义势力所兼并。洋务运动实际上无疾而终。

总之，鸦片战争以后，“外国资本主义对于中国的社会经济起了很大的分解作用，一方面，破坏了中国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的基础，破坏了城市的手工业和农民的家庭手工业；另一方面，则促进了中国城乡商品经济的发展”<sup>①</sup>。同时，在鸦片战争的刺激下，中国萌发了学习、效法西方资本主义某些形式的设想，并且也开始从实践上实施这些设想，从严格意义上讲，这些设想及其实践并不属于资本主义的范畴。因为，其倡导者（无论是地主阶级的思想家、改革家，还是农民领袖）的目的最终都是为了维护封建政权。社会的代表者无法认识资本主义的实质，因而难以描绘出完整的资本主义发展蓝图，更无力量实现它。历史唯物主义认为，资本主义是比封建主义更高级的私有制形式，只有变更封建主义的政权为资本主义的政权，才能真正发展资本主义，腐朽的封建制度的躯壳难以容纳资本主义的先进生产方式的内容。因此，洋务派试图在不改变清朝封建统治制度的前提下，借助引进外国资本主义机器生产来维护和巩固封建统治，犹如是欲将资本主义的物质文明之花移植到老朽的清朝封建主义之木上，这自然不可能成功。这一失败无疑又给后来的资本主义共和国蓝图的描绘者留下了可资借鉴的教训。

①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26页。

## 二 昙花一现的共和国

洋务派移花接木式的资本主义尝试没有成功，却使中国产生了一批早期资产阶级改良派。他们是从洋务运动的发展中逐渐从洋务派的阵营里分化出来的。其代表人物有王韬、薛福成、马建忠、郑观应、陈炽等。早期资产阶级改良派出现于洋务民用企业创办前后，他们的思想主张主要是，保护和发展民族工商业，反对外国资本主义的经济侵略；学习和仿照西方，变封建君主专制为资本主义的君主立宪制。作为早期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想家，其零零碎碎的思想拼合在一起，已足以构成一幅资本主义的发展蓝图了。但是，他们的资本主义改革的呼声尽管已触及实质却还很微弱，还不足以形成一股震撼整个社会的资本主义改革思潮。

甲午战争以铁一般的事实最终宣告了洋务运动的基本破产，它也着实再次惊醒了又一部分有识之士。在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派的奔走呼号下，资产阶级的维新改良思潮迅速形成一股声势浩大的社会改革思潮。他们在早期资产阶级改良派的思想基础上，拼凑起了一幅比较完整的中国式的资本主义君主立宪国家的蓝图。在百日维新中，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派通过光绪皇帝颁布了110条维新法令，囊括了政治、经济、军事及文化等方面的资本主义改革内容。康有为还设计了改革后的君主立宪国家的中央机构：仍以光绪帝为君主，中央设制度局，下辖工、商、铁路、农、矿务、邮政、法律、度支、陆军、海军、学校、游会等12局，由12局组成以维新派为主的责任内阁式的政府，实行政治、立法、司法三权

分立。康有为、梁启超的改良维新，触犯了以慈禧太后为首的顽固守旧官僚的既得利益，故尔受到百般阻挠。由光绪帝颁布的维新法令丝毫起不到行政和法律效力，维新派的资本主义君主立宪国家发展蓝图基本上给终停留于纸上，尽管如此，维新派仍旧付出了血的代价。这场改革最终以“戊戌六君子”血洒京城、康梁仓惶出逃而告终。百日维新失败的原因是复杂的，但其中的根本原因就在于中国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康梁也曾效法中世纪欧洲资产阶级的前辈，试图以托古改制的方法来“演出世界历史的新场面”<sup>①</sup>。脱胎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维新派，在政治上不敢和封建势力彻底决裂，更认不清帝国主义的真实面目，企图在不发动广大人民群众参加斗争的前提下，通过与封建势力相妥协并取得帝国主义的帮助，以避免流血的方式和平实现资本主义理想，这当然也只能是一种幻想。

但是，康梁在百日维新后继续醉心于其资本主义君主立宪迷梦。不久，康有为完成了《大同书》的写作。《大同书》描绘了一个极为完整的、看似空想社会主义实是资产阶级的理想王国。在康有为的大同世界里，没有国家，没有君主，没有军队，没有等级，没有家庭，没有私有财产，没有种族歧视，男女平等，科技发达，生产兴旺，人人幸福。显然，这种空中楼阁式的构想大同世界是根本无法在康有为的时代里实现的，因为，正如毛泽东所指出：“康有为写了《大同书》，他没有也不可能找到一条到达大同的路。”<sup>②</sup>

就在康有为苦思冥想大同理想世界时，以孙中山为代表

---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603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71页。

的资产阶级革命派正在三民主义的旗帜下为他们未来的资产阶级共和国而坚持浴血奋战。清政府面临愈益严重的统治危机。1900年，列强借口义和团事件联合出兵中国，八国联军的铁蹄蹂躏了中国北方大地。清政府为了获得列强对其统治的支持，通过《辛丑条约》再次出卖了大量主权，暴露了清政府彻底投靠帝国主义“洋主子”的真面目。为了挽回其已经扫地以尽的威信，清政府宣布实行“新政”。其主要内容有：改革军制，设立新警政；提倡和奖励实业；废除科举考试制度，设立学堂，提倡出国留学，等等。可见，这些“新政”只不过是康梁维新主张中一些不痛不痒的老调重弹。结果，“新政”导致了苛捐杂税的大量增加。资产阶级革命运动和维新立宪运动日渐高涨。为了消弭革命，强化其自身的统治，拉笼维新立宪派，清政府于1906年宣布实行预备立宪。1909年，各省成立咨议局。次年，北京设立资政院。按照清政府的解释，咨议局和资政院是进一步设立议院的基础，事实上它们只是宪政咨询性质的机关，并不是资产阶级民主立宪制度的象征和标志。这场假立宪的骗局拖延了数年以后终于于1911年“皇族内阁”公布后不揭自穿。通过清政府这一系列丑陋表演，越来越多的原维新立宪派人士加入了与革命派合作共同对付清王朝的斗争。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的枪声敲响了清王朝的丧钟。次年元旦，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在革命派武装斗争的硝烟中诞生于南京。这是中国历史上的最近乎完美的资产阶级共和政府。根据《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组织大纲》，南京临时政府设5个部，各部部长由大总统提名。由于临时政府是以资产阶级为主体，内含立宪派、革命派、官僚军阀的庞杂政权，孙中山在实际组织政府时为调整政府内部各派势力的关系，将原5个部扩充为外交、内务、陆军、财

政、司法、交通、实业、海军、教育等9个部，并由各派分掌9部。南京临时政府在短短的3个月时间里，颁布了一系列有利于资本主义工商业发展和文化教育等改革的法令。资产阶级民主共和观念在资产阶级政权的支持下广泛深入人心。

南京临时政府的成立在中国历史上具有重要意义。在洋务运动和百日维新失败以后，历史已向人们昭示，无论是地主阶级的改革，还是资产阶级的和平改良，都无法导致资产阶级政权的建立。辛亥革命的胜利表明，在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历史条件下，帝国主义与封建主义势力相勾结，反革命势力十分强大，因而，只有通过暴力革命的手段，才能推翻封建专制的统治，建立起资产阶级的共和国。

临时政府虽然成立了，但是它在财政上面临巨大的困难。清政府的反革命军队还在前方与革命军队对峙，控制着各省的军阀仍在观望，临时政府不可能从地方各省的督抚手中获得财政上的任何支援。由于帝国主义不承认孙中山为大总统的临时政府，它不能从帝国主义所把持的海关中取得关余（海关收入中扣除偿还外债的剩余），也很难通过帝国主义在华设立的大量的金融机构中得到贷款支持。同时，临时政府也不能从民族资产阶级那里获得足够的财政支持。这首先是因为，帝国主义控制了中国的财政经济命脉，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经济力量十分有限。辛亥革命爆发以前，中国海关、常关及盐课的管理权已尽入帝国主义之手。粤汉、正太、沪宁、陇海、沪杭甬等14条铁路为帝国主义所控制，在中国全长4800多公里的铁路中，中国人自己控制的仅300多公里。帝国主义通过中国的82处通商口岸疯狂进行自然资源农产品的掠夺和廉价收买以及商品倾销。英、德、日、法、俄、意、

荷、美等国在华设立 21 个银行、101 个分银。中国的机器采煤 91.9% (1912 年)、生铁生产 100% (1911 年)、棉纱生产 76.7% (1908 年)、内外航运 84.4% (1907 年) 为帝国主义所掌握。帝国主义仅给中国的民族资本留下极为艰难而狭小的生存空间。更重要的是，民族资产阶级经济上的软弱使他们在政治上成为一个“动摇的阶级”。即便在辛亥革命这一中国资产阶级革命的黄金时代里，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也未像英、法、美等国资产阶级革命时这些国家国内的资产阶级所焕发出来的那样高的革命热情。也就是说，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不能够也没有从财政上给南京临时政府予足够的支持。总之，在半殖民地的历史条件下，中国民族资产阶级这一革命的主体极为软弱，他们在政治上和经济上都仍与封建势力和帝国主义侵略势力保持千丝万缕的联系，他们在革命中虽提出了鼓励农民群众参加革命的“平均地权”的口号，但实际上并没有完整的、切实可行的反封建纲领；同时，他们甚至不敢提出反对帝国主义的号召，这种革命的不彻底性，是导致辛亥革命及南京临时政府最后陷于绝境的根本原因。

在中外反动势力的联合胁迫下，革命派拱手把临时政府交给了帝国主义及中国大地主大买办阶级的代理人袁世凯。孙中山卸临时大总统职前，颁布了《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以期限制袁世凯，保证袁世凯临时政府的资产阶级性质。《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是一部资产阶级性质的宪法大纲。它明确规定，中华民国是“中华人民组织之”，其主权“属于国民全体”。中华民国仿照西方的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制度，以参议院、临时大总统、国务员、法院“行使统治权”，确立行政、立法、司法三权分立的体制。它根据资产阶级天赋人权的原则，宣布公民一律平等，公民都享有人身、住宅、私有财产、言论、